



张越: 史学史: 学科建设与研究方向

热

张越: 史学史: 学科建设与研究方向

[作者: 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 转贴自: 《史学理论研究》2009-03 点击数: 177 文章录入: teadmin]

在历史学因其人文特征所导致的那些非实证属性被普遍关注的今天, 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尤显重要。史学史研究不仅展示了历史学自身发展的具体过程, 而且成为那些理论阐发的事实依据。中国的史学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对史学史作学科意义上的理论构建和全面研究, 则主要反映于新中国建立后至今的60年中。

新中国建立之后, 开始了对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全面构建。1961年, 因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 史学史作为高校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程, 其教材的编写成为亟待进行的一项工作, 缘此契机, 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先后召开座谈会, 就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对象、任务、分期、目的、教材撰写原则和方法等作了较为广泛的探讨^①。这番讨论对史学史研究的影响虽因随后的“文革”而中断, 但是其对史学史学科自身的反思与审视的意义和价值仍不可忽视。如白寿彝撰写的《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②两篇文章, 前者将史学遗产区别于历史遗产作专门论述, 提出对史学基本观点的研究、对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对历史文学的研究等史学史的主要研究内容; 后者通过对规律和成果、理论和资料等史学史研究任务中一些基本概念的辩证分析, 将史学史研究中的主客体关系作了说明。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③一文, 在分析了一些外国史学家对史学史所下的定义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史学史的自身特点, 对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尽管当时的讨论不免存在着某些时代印记, 但是从总体上看, 通过讨论所获得的对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史、史学史的研究目的是什么、史学史应如何分期、分期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的初步认识, 正是此前以要藉解题为主要特征的史学史研究所亟需充实的“史学之义”^④之内容。

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史研究成果, 大体是建立在新中国建立前对史家、史书的要籍解答题的研究基础之上, 再辅以新中国建立后对史学史的讨论所形成的基本认识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些新见解综合而成的。白寿彝曾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范围归纳为: “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 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 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 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⑤将此表述与当时史学史研究的成果形式联系起来看, 80年代的史学史研究更注重从时代特点把握史学发展走向, 并关注史学自身的社会作用的体现。从历史发展的时代特点来审视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 促使史学史研究者能够从史家、史书中将研究视野扩展开来, 对历史学的发展节奏与特点、整体脉络作宏观分析。史学史的研究内容得以延伸, 史学史的研究目的得以深化。历史、时代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 是新中国建立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重要收获, 也为史学史研究的多途发展开辟了道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史学史研究从多方面呈现出了向纵深拓展的态势, 主要表现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以及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等几方面。

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曾经以史著文本为主。受西式学术分类体系的影响而在中国产生的史学史学科, 承载的是中国史学自身两千余年历史的厚重内容, 因而, 一段时间里专注于研究史著以及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等, 从而在整体上表现出要藉解答题的研究特征, 这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是有其必然性的。经过60年代和80年代对

^①相关情况可参见《中国史学史资料》1961年第4期载《关于中国史学史(古代部分)的讨论》、《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等。

^②白寿彝:《谈史学遗产》,《新建设》1961年第4期;《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商榷》,1964年2月29日《人民日报》。两文均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

^④齐思和曾批评20世纪40年代成书的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为“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见齐思和:《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燕京学报》第32期,1947年6月。

^⑤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中国史学有了一番时代与史学之互动性的宏观研究之后,更为深入的专题研究再一次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趋向。比较明显的,就是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入手,进而梳理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长期以来,中外史学界有一种看法,即认为中国史学以叙事见长而没有理论。此种见解的误区,一方面是以西方史学作为参照系来直接比附中国史学;另一方面就是以今人所谓的史学理论去看待古人的思想建树。之所以如此,现代学科分类带给人们的某种思维定式不无些许消极影响,而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未能深入挖

掘和系统研究是更重要的原因。中国古代史学家和思想家的序录、札记、论赞、题跋、随笔等各种资料中有着丰富的史学评论资源,这些资源包含在辞章考据、经史注疏等不同体裁体例的著述中。史之“要义”是伴随古代中国史学相始终的诉求,是中国古代史学独具特色的境界和气质。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作专题研究,则是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反思近现代史学理论、比较中西史学理论的基础。目前的研究成果,或分时段,或分专题,或纵向梳理,或横向论述,开始梳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方面的理论遗产。近期出版的《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分典》,其中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总部”。在“历史理论总部”,分论天人、论古今、论地理、论时势、论华夷、论国家、论正统、论分封、论兴亡、论鉴戒、论风俗、论人物共12个部分;在“史学理论总部”,分史学功用、史家修养、史学方法、史学批评共4个部分。由此汇集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大量资料。虽然各部分的内容均取自古代学者的相关论述,在所设类目中却清晰体现了今人所认识和理解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范畴与内容。^①

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归纳总结,既可以看作是对前期注重史学与时代互动关系的史学史研究的突破,也可以看作是将史学史纳入学术史视角研究的回归。事实上,20世纪末和21世纪以来,将史学史纳入学术史的视角中深入考察史学的自身发展、突破狭义的史学畛域而涉及影响史学的诸多学术因素做综合研究,已经比较明确地成为史学史研究的主要趋向。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诸如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经史关系、文史关系、史学的经世致用以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等问题,都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新课题。众所周知,传统学术之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固然将史部“独立”出来,但古人治学却从未因此畛域,所谓义理、考据、辞章之学无不贯穿经史子集各部。如果以今人专门学科的眼光讨论古代“史学”的内容,诸多含于传统学术中的史学资源或许会被忽视,史学史研究就会有不全面、不充分的缺失。对中国古代史学做学术史的考察,意在更多地回归于在传统学术诸多因素之中理清史学的发展脉络,探析史学自身的撰述形式和理论内涵,研究史学与经学、文学问的错综关系,揭示那些隐藏在史学发展表面之后的线索。打破相沿的选题思路,将古代史学研究的触角延伸至与之相关的各个层面和领域,是近年来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最新动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成为热点。中国史学发展到晚清时期,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发生了显著变化,以“从现在看过去”的角度而言,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对当下史学的发展及未来史学的展望无疑更有意义。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范围先从晚清到五四时期,再沿至新中国建立前、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史学、改革开放以后的史学。其中,

^①见瞿书铨、瞿林东主编《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分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在剧变的社会局势中考察史学思潮与流派特征与走向、探究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分析史学转型之际新旧中西诸因素间的张力等方面,均有材料与分析俱佳成果问世。学术史范畴的近代学科体制的建立、学术期刊的出现与影响、专业学会的兴起与运作等研究课题,也延伸到史学史研究的视野中,反映为对近代历史教育教学体制、史学期刊杂志、历史教科书、历史学会团体等的专门考察。当年梁启超把“最近史学的趋势”作为史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展成为今天颇具规模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领域。

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日益深化,却使得该研究领域愈来愈成为中国史学史整体时段中的“专门领域”而存在,中国近代史学是承续古代史学而来,对中国古代史学与中国近现代史学在研究时段上的“分野”,固然利于研究的集中与便利,却人为地阻隔了二者在实际上联系。究其缘由,恐怕还要归之于20世纪60年代对史学史研究的“分工”。^①瞿林东说:“长期以来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近代史学从理论到方法都是从外国输入的,是因‘摒弃’了传统史学才产生的。这种看法无法解释近代史学为何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故与近代史学的客观进程是不相符合的。”^②在当今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相对充分的情况下,不仅应努力突破上述在研究时段上的“分工”,而且在研究内容上,更应对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作贯通的考察,将中国古代史学与中国近现代史学视作一个“通”的发展整体作全面的梳理与研究。日益受到关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也同样如此。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重要著述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专门研究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还应当强调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放入整个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进程中作综合考察,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近现代中国史学的整体背景下产生发展的,是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中孕育成长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仅是拥有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指导,它同样包含有传统史学的诸多因素,并且受到了近现代史学其他思潮流派的多方影响。白寿彝生前主编、至2006年底全部完成出版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可以视为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史学通史研究的代表作。

前辈史家早已认识到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耿淡如指出:“史学史也和历史一样可分为国别史学史和断代史学史,也可综合地去研究,作为世界史学通史。由于各国史学的发展很不平衡,它可采用比较方法,在和社会发状态联系下,来阐明各国或各时代史学发展的异同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③齐思和说:“中国和欧洲的史学传统,是世界上两个主要的历史学传统,我们正可以加以比较研究。”^④可见,中西史学比较的学术意义已经得到了明确的认识,区别于历史比较(comparative history)的史学比较(comparative his toriography)的概念也逐渐清晰。加强比较史学研究,不仅能够深化对西方史学的认识,而且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史学,因为只有把中国史学放到世界史学之林中进行比较

①当时是以白寿彝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有关人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以吴泽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人员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史,耿淡如所在的复旦大学的有关研究人员研究西方史学史。

②瞿林东:《近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

③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

④齐思和:《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江汉学报》1963年第6期。

研究,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国史学的发展特点。让别人了解中国史学,让我们借鉴西方史学,通过中外史学比较,把中国史学升华到世界史学之林中应有的地位。在了解外国史学传统的深层意蕴的同时,也获得一个观察中国史学的坐标,更有利于中国史学的发展。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需建立在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均有相应研究的基础上。上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史学引进规模的扩大与中西史学交流的频繁的背景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较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为研究者所认同。相关研究成果所论述的内容及问题意识的切入点均有了全方位的提高。大体说来,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主要是:比较中西古代史学的研究成果比较多见,课题范围多集中于比较中西古代史家及史著、比较中西史学的起源及发展途径等。

近十年来,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开展显得较为艰难,笔者认为,比较研究主体以及研究对象的不平衡因素是客观原因,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之理论与方法的薄弱是主观原因。

就研究主体而言,足以担当中西史学比较的研究者,必须具备兼通中西史学的学识素养,如朱维铮所说:“中外史学比较,首要的前提就是研究者需要对古今中外史学的基本进程有整体的了解,这岂是个别史家所能胜任的?”^①很显然,真正做到中西史学兼通的学者屈指可数。要对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有更高的要求,如果研究者仅局限于对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的一般了解,或对中西史学两者间的认识程度深浅不一,则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如果说研究主体的知识程度是影响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客观因素的话,那么,对中西史学的基本认识与价值判断,以及由此涉及的在比较中西史学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认知与处理方式,则是影响中西史学比较的关键因素。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中国学者对此的充分重视,而西方学者对此鲜有提及。这至少说明,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家在中国史学的知识背景下是承认并且重视西方史学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的。对比之下,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的了解、判断却不无片面和偏颇。此外,中国学者在史学比较中并未端正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等同位置,而是有意无意地以西方史学作为某种衡量“标准”,用中国史学去与之“比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无论是西方史家对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轻视,还是中国史家在中西史学比较中的“轻中重西”,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的话语霸权意识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德国史家吕森(Jtirn Rtisen)指出:“我们必须避免把有关历史思维的西方文化传统当作比较的基础。”^②存在于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中的问题,在近年有扭转之势。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还亟待对中西史学比较本身的理论与方法作进一步的充实与完善。其一,从比较的对象和内容来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突破,将不应再局限于中西史学间过分具体的两两对比。以往一说起比较研究,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找出那些中西史学间相类似的史家、史书等进行比较,诸如司马迁与希罗多德的比较、《史记》与《历史》的比较、章学诚

①朱维铮:《史学史三题》,《复旦学报》2004年第3期。

②参见吕森:《跨文化比较历史学的若干理论分析》,陈新译,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与柯林武德的比较,但是,历史上没有两件事情是完全一样的,历史有类似没有相同,更不会重演。中西古代史学原本是在互不了解、互不交叉的不同的文明渊源中各自发展的,如果过分强调进行具体地两两对比,忽略中西史学间存在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差异,往往最终会出现是否有可比性的疑问。中西古代史学在各自的发展中都涌现了许多史家,出现了许多史著,形成了各自的历史意识和史学传统,对史学的认识以及史学所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既然比较的对象各自独立,就有可能更最大限度地发挥比较者的理论构想,由比较者以其设定的比较范围或比较概念将中西古代史学的某个方面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因此,在比较研究中尽管存在着“可公度性”和“不可公度性”的讨论,但是将特点各异的中西古代史学作共时性比较,从中西史学间的史学理论特点、理论思维方式的差异、治史旨趣与史学精神的差异进行比较,关注深刻影响史学发展的中西间各自的文化传统,探讨中西史家对历史发展动因、历史发展进程、天人关系等历史理论问题和史学功用、撰史原则、据事直书等史学理论问题的基本结论、思维路径、表述方式的特点,其可比性可能就要大得多,比较研究的空间就会显得更为广阔。目前看来,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趋势值得肯定:从中西史学间的个案比较发展到对中西史学发展过程的总体性比较;从中西史学间诸问题的谁先谁后、谁有谁无、谁优谁劣的简单对比,发展到从双方史学在观念、编纂、文化背景、内在价值、影响等多重角度进行综合性比较。其二,再看晚清以后的中国近代史学,情况则发生了变化。中国史学在输入西方史学的同时,不断学习和借鉴西方史学,并努力在结合中西史学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新史学,而西方史学也开始知道并了解了中国史学(尽管这种了解还十分有限,还存在着曲解、误解)。一百年来,中西史学不再是不通声息独立发展,至少中国史学在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西方史学的明显影响。相对而言,中西近代史学的比较研究比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理论上更具复杂性。目前所见的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上,比较近代以来的中西史学还不多见,即说明

了近代中西史学比较的难度更大。

史学史学科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历史学发展的纵向回顾，更在于通过总结不同时段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深化对历史学自身的理性认识。以史学史研究为基础，继续深化对中国史学史和中西史学比较方面的研究，将会有助于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历史叙事等一系列围绕历史学而形成的思辨式的和方法论层面的探讨。新中国建立60年来的史学史学科建设成就斐然，更多的问题仍然需要研究者继续探索、继续努力。

- 上一篇文章： 黄现璠先生简历和著述编年目录
- 下一篇文章： 于沛：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

[【发表评论】](#)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最新5篇热门文章

- 刘大年逝世10周年追思会在京举...[203]
- 恭祝大家新春愉快[183]
- 怀念齐克彬同学[164]
- 黄征：敦煌学翻天覆地三十年[96]
- 《中华古籍总目》编纂拉开序幕...[228]

最新5篇推荐文章

- 《史学研究网》寄语[5954]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管理登录](#) |

2004-2007版权所有：史学研究网